

建安風流人物

鄭孟彤



责任编辑 李之杰

262

建安风流人物

郑孟彤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92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330册

*

ISBN 7-203-00290-X

G·57

定价: 3.10元

《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茂元 王 起 王 瑶 冯其庸 何 洛
余冠英 季镇淮 姚奠中 唐 弢 萧涤非

《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最近出版书目

李贺诗传	刘 衍著
诗经述论	冼焜虹著
南北朝的诗和散文	金汉祥著
汉代散文史稿	韩兆琦著
北宋词坛	陶尔夫著
唐五代词评析	徐育民著
盛唐边塞诗评	漆绪邦著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	林志浩著
先秦散文纲要	谭家健 郑君华著
李白新论	刘忆萱 管士光著
建安风流人物	郑孟彤著
柳宗元散文艺术	吴小林著
李清照诗词新论	刘瑞莲著

内 容 提 要

建安文学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文学成果，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鲁迅语），它的发展和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表现”（郭沫若语）。

本书在论述建安文学时，突出了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及建安七子，并以较大篇幅论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作家蔡琰。全书有史有论，论中有史，史中有论，对建安文学中杰出作家的传略、代表作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论析深刻透彻，阐述鞭辟入里。

本书也可视为断代文学史的读物，是一本对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建安文学有见地、有新意、有启示的一本专题读物。

《建安风流人物》为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之一。

目次

第一章 概说	(1)
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社会背景.....	(1)
第二节 建安文学的发展趋势.....	(8)
第三节 建安风骨.....	(19)

第二章 建安文人集团的倡导者——曹操	(24)
第一节 曹操的生平与思想.....	(25)
第二节 曹操诗歌的思想内容.....	(28)
第三节 曹操诗歌的艺术特色.....	(47)
第四节 曹操散文的成就.....	(53)

第三章 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曹丕	(66)
第一节 曹丕的生平.....	(66)
第二节 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的成就.....	(69)
第三节 曹丕的诗歌.....	(85)

第四章 现实主义诗人——曹植	(102)
-----------------------------	---------

第一节	曹植的生平	(102)
第二节	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	(105)
第三节	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130)
第四节	曹植的其他作品	(141)

第五章 建安七子 (160)

第一节	孔融	(161)
第二节	王粲	(174)
第三节	刘桢与陈琳	(192)
第四节	阮瑀、徐幹和应瑒	(204)

第六章 蔡琰与孔雀东南飞 (217)

第一节	蔡琰的《悲愤诗》	(217)
第二节	孔雀东南飞	(227)

第七章 建安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244)

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历史地位	(244)
第二节	建安文学对后代的影响	(254)

结束语 (261)

第 一 章

概 说

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社会背景

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文学史上所谓的建安文学，实际上是指汉灵帝中平六年（189）董卓作乱起至曹魏黄初、太和（232）年间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在这期间，许多杰出作家，写出了不少面貌崭新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外戚、宦官互相倾轧，政权迭换。从汉章帝章和二年（88）章帝死后，和帝继位起，历朝间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从不间断，而且愈演愈烈。汉顺帝汉安三年（144）顺帝死后不久，桓帝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握朝政，权力极大，“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①。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他来决定。梁冀贪得无厌，大肆搜刮财富，霸占田园，“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藪，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

里”②。梁太后死后，桓帝联结了一批宦官，杀掉梁冀，自公卿大臣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有好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而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冀有功，同日封侯。从而宦官的淫威大盛，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金银赍賂，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③。延熹10年（167），汉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任大将军辅政。当时宦官势力很猖獗，窦武与官僚陈蕃、李膺等密谋，准备消灭宦官集团，但因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先发制人，发动政变，杀掉窦武、陈蕃，独霸朝政，宦官势力达到了最高峰。正由于外戚宦官迭互擅权，造成了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负担繁重；加以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不断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也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沦为农奴；同时，由于当时水利失修，连年灾荒，这就更迫使人民走向绝境，无法生活了。据史载，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有几十万农户倾家荡产，流浪在外，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延熹九年（166），豫州发生大饥荒，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至有灭户者”④。灵帝时，“河内（今河南省武陟县）人妇食夫，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县）人夫食妇”⑤。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仍对羌族连年用兵，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征发不绝，人民疲于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闢，禾稼不得收入”，这就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在死亡线上的农民被迫纷纷暴动，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从汉安帝开始，农民到处发动武装起义。据史载，各地发生民变的有67次（实际不止此数）。在广泛的农民起义中，起着摧垮刘汉统治政

权的中心作用的是黄巾起义军。

黄巾起义军领袖张角，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自称“大贤良师”。他利用“符水”给人治病，吸引了很多信徒，派到各地去传教，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张角按照军事编制把他们分为三十六方，各有渠帅领导，统一归他指挥。经过长期部署酝酿之后，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二月爆发了。他们揭竿而起，就到处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坞壁，州郡官员纷纷逃亡。十来天里就得到天下响应，洛阳震动，给东汉反动统治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后来起义军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了，但东汉帝国也由此而名存实亡。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袁术据扬州，刘表据荆州，公孙度据辽东，袁绍据冀州，公孙瓒据幽州，刘焉据益州，曹操据兖州，张绣据南阳，陶谦、吕布先后据徐州，孙策据江东，刘备因实力不够，没有一定地盘，转辗依附曹操、袁绍和刘表。他们连年混战，互相兼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纵火焚烧洛阳城内宫殿宗庙府库民家及其周围二百里内城市村落，并以步骑驱迫数百万人西迁关中，人民饥饿困顿，积尸满路。董卓被王允、吕布杀死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纵兵掳掠，杀人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青州向来是富庶的地方，户至百万，刺史焦和参加内战，“不暇为民保障……州遂萧条，悉为丘墟”⑥。曹操破陶谦，攻陷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⑦。等等。经过这样残酷的战火浩劫之后，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

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对现实具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于建安元年（196）挟持汉献帝到许昌后，为了稳定其统治，实行从两汉发展起来的屯田制，兴修许地河渠，开辟稻田，召募流亡农民、逃亡奴隶回来屯垦；另一方面，又命兵士于休闲期间，随地开垦，且佃且守，无论民屯、兵屯，其组织均依军事编制，结果“所在积谷”，战时没有运粮之劳，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也因之逐渐恢复，相对地稳定了占领区内的社会秩序。曹操以其掠夺和剥削得来的物资和人力，几年之内，先后消灭了北方的“群雄”，特别是大破地广兵强的袁绍，尽得袁绍所据的冀、青、并、幽四州，使曹操军威大振。但赤壁一役，竟被刘备和孙权的联军所败。从此，形成了曹操、刘备、孙权鼎足三分的形势。

三国鼎立后，各国统治者虽然都稍为注意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力，并实行了某些措施。但是，他们为了求私欲的满足和地盘的扩张，兼并战争还是继续进行着。如曹丕的大举伐吴，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以及蜀吴会师大举攻魏等等，无情的战祸仍给人民以很大的危害。

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社会思潮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但是，到了汉末，在这非常的社会变乱中，它已失去了支配人们的力量。人们的思想意识都从儒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名、法、道、佛等各家思想便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而名家却是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潮。名家，也称形名家或刑名家。其内容包融儒、法、道以至于其他诸子的学说。它在汉末广为流行而形成一股影响很大的时代思潮。它以综核考校名实为主。王符《潜夫论》说：“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这种要求名实相符是和孔子正名说相一致的。

正如曹操在《对酒》诗中所表达的思想那样：“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因而曹操终其一生，不敢取代汉室称帝，只做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正是体现出他的刑名家学说中的儒家正名观。而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以继汉为正统而自许的。他在《与李丰教》中又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也。”显然也是受了这种思想影响的。

然而，融会在刑名之学中最明显而丰富的却是法家。当时人们对法治颇为重视。曹操早年“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但当他一踏入仕途，却采取法治。《三国志》注引《曹瞞传》写道：“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可见其执法之严。曹操是主张法治的，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说：“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全是法家的言论。从曹操一生行事来看，前人说他“持法峻刻”、“机变无方”，这正是法家一贯的主张。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着重指出：“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

据《三国志·蜀志》本传载，诸葛亮早年“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正说明了他对法家的仰慕。陈寿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传后评论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诸葛亮是以法家路线治理蜀汉的。其实，街亭

之败，他斩马谡以正军法，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至于孙权，他在回答陆逊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时说：“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从这也可见孙权对严刑峻法的态度了。

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法治路线。上有好者，下必有效尤者，所以，建安时期法家思想的风行就不足为奇了。

刑名之学，在汉魏之际，广为流行。它不仅旁通儒、法，而且还含蕴有道家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尹文子》“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这就说明了名家与黄老道家的关系了。曹操在《自明本志令》中曾说自己有过这样的思想活动，即“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来往之望”。这和《庄子》的“曳尾舞于涂中”的思想无疑是有关联的。诸葛亮的《阴符经序》说：“所谓命者，性也。性命能通，故圣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故曰天机张而不死，地机弛而不生。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教天下，而不见其机者，天机也。”这纯然是黄老之学。不过，曹操和诸葛亮在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却是把其消极方面转变为积极治世这方面了，这正是汉魏之际的人们经历所形成的思想特色。

这里，我们还不能忽略的是流行于当时的另一种社会思潮——佛教。它是与由道家转化的道教相并行而会通的。佛教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开始于东汉初年，当时人们认为佛教和黄老之学差不多。东汉末，汉桓帝刘志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

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去祭老子。襄楷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岂获其祚哉？”这就把佛学和黄老之学看成是一回事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汉魏之际所释的佛经中，常有道家 and 道教的语词，也就是用中国自己的道家或道教的观点去解释佛学，使之依附于中国流行的宗教学说，得以广为传播。从这一点上说，它颇与刑名之道相通。佛教当时影响很大，它所宣扬的教义，无论是贫困无告的劳动人民，或是企求永保富贵尊荣的统治者，都能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因而它也影响到建安文学。曹操的《秋胡行》二首、《陌上桑》等乐府诗，都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一点。

建安文学就是在上述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从中既可看出社会现实的影子，也透露出时代的精神面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各家思想的自由发展，使得当时文学获得了各种充实、生动的内容。可以说，这时期作家在创作上之所以取得辉煌、巨大的成就，主要在于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所给予他们深刻的教育和丰富的题材。

①②《后汉书》卷六四《梁冀传》。

③《后汉书》卷一〇八《单超传》。

④《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⑥《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⑦《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第二节 建安文学的发展趋势

中国文学发展到了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或散文，都完全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上，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蜀、吴很少作家和作品。由于当时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文学和善于招揽文士，因而许多作家都围绕在他们的周围。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及女诗人蔡琰。所谓“曹氏父子”，就是指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就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评述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和刘桢。他们的创作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祢衡、繁钦、杨修、吴质、路粹、丁仪、丁廙、邯郸淳等人，也都以自己的才华在创作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那么，建安文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呢？

任何一种事物，都是经萌芽而发展起来的。在这发展过程中，必然因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不同的阶段。作为历史上的“建安文学”，也不例外。从它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艺术手法来看，都有所差异，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汉灵帝中平6年（189）董卓作乱起，到汉献帝建安13年（208）赤壁之战止，可说是前期。在这期间，由于贵族官僚和地方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出任州牧郡守，他们积蓄力量，拥兵自强，互相攻掠，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在这场大动荡、大屠杀的年代里，文人士子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苦难，

对现实生活有比较深切的体验。这就使他们的创作基本上都反映了这一战乱的社会现实：或是描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惨状，或是抒写军旅征戍之苦，或是抒发流离思乡之愁。如曹操的《薤露行》：“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遭受战乱残害的悲惨景象，使人触目惊心。至于曹操的《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黑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前者描绘了一幅征途险阻、人饥马饿、无所栖宿的行军图景，反映了征旅之苦；后者是通过筑城卒和他妻子的对话，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所加给人民的深重灾难。而王粲的《登楼赋》却是表现了作者处乱世而壮志不得伸展和思乡怀土之情。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以悲痛感伤的基调，反映了战乱的现实，如泣如诉，沉痛感人。作者直抒胸臆，不假旁托，直截了当地抒写内心抑制不住的痛苦和感伤，构成了这一时期慷慨悲凉的典型音调。

然而，面对着这残酷的现实，作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们对人生的前途仍然抱有希望和理想。曹操的《军谯令》一开始就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他的《对酒》诗更明显地

提出了他的理想社会：“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栋梁。”王粲的《登楼赋》：“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瓠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这都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王粲在《七哀诗》中写出了他在避难荆州途中所见到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的触目惊心的惨状，但诗人也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人生的目标。他在诗末写道：“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所谓“霸陵”、“下泉”，无疑是表白了他由乱思治的思想感情。这就说明了这一时期以悲痛感伤为主要基调的作品中仍然含有理想因素。作家经历了动乱，描绘了动乱，但也希望以治世代替乱世。这种理想因素就构成了整个建安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艺术手法上，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的质朴古直。作家在描绘社会现实时，似乎无暇做过细的思考，常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接叙写其所见所闻。一般来说，作品的语言运用及其立意构思，很少采用比兴手法。作家在表现惆怅悲伤的感情时，往往直抒胸臆，有啥说啥，毫不曲折迂回。这一时期的作家，受汉乐府民歌影响很大，他们的作品更多地保留了汉乐府民歌质朴无华的特色。

从建安13年以后到黄初、太和年间，是建安文学的后期。

这一时期，虽然战争仍在不时发生，但已不象前一时期那样战乱频仍，死亡惨重。魏、蜀、吴三方都在各自的领土内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团结相邻的少数民族，积极发展生产、巩固各自的政权。因此，比起前期的太混战、大动荡就显得相对的稳定了。特别是曹魏集团一方，生产发展较快，人民生活颇为安定，甚至

个别地方出现了“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馗”（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五）的现象。

同时，当时许多著名的文人，如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徐干、应瑒、邯郸淳、繁钦、路粹和丁仪兄弟等，都已通过不同的途径，先后投靠曹操，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在政治上有了依靠，在文学创作上，也得到曹氏父子的鼓励与支持。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们的生活又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多次随军出征，体验过戎马倥偬的艰辛和苦难，但也确实有不少时间安居邺城，经常和曹丕兄弟在一起饮宴歌舞、游园射猎、唱和诗赋，过着比较安闲奢华的生活。这就使得他们在创作时有时间去构思，题材范围也扩大了。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仍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题材。昔日的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创伤，还历历在目，而当时新的战争还在不断进行。新的战争虽然和以前的并不相同，但也给人们造成了很多苦难。这就使当时不少作家忧伤满怀、感慨不已，写了好些有关这方面的题材的作品。曹操的《却东西门行》：“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反映了当时征夫到老不得还乡的痛苦。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却以感伤的笔调，描写洛阳城被董卓焚掠后的荒寂景象。蔡琰的《悲愤诗》以沉痛的心情，叙述战乱造成的流离死亡之苦，母子被迫分离之痛，字里行间，饱含着血泪。这些作品，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深切的体验，因而写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